

心理学与人类学的再联结

——布鲁纳文化心理学中的人类学经验

李鹏程^{1,2*}, 罗媛¹

(1. 河西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张掖 734000; 2.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在促成心理学与人类学的再联结以及推动文化心理学的发展中,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杰罗姆·布鲁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初识人类学”“与人类学的密切接触”和“布鲁纳的人类学实践”三个方面,展现了布鲁纳及其文化心理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密切关联。同时,对布鲁纳文化心理学进行了类型学分析,追溯了其“文化观”的人类学谱系,指出人类学中符号主义学派和文化相对主义学派对布鲁纳文化心理学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展现布鲁纳的学术经历及其文化心理学中被忽视的“人类学经验”,既有助于全面了解文化心理学的学术发展史,同时也能更好地反思创建心理学这门学科的“初心”。

关键词:杰罗姆·布鲁纳;文化心理学;人类学经验;心理学史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24)01-0003-08

1 引言

文化心理学是近些年来心理学中发展最快、同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之一,被誉为是继行为主义、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之后的“心理学第四维度”(Ambady, 2011)。在国际心理学界,从1879年科学心理学诞生至1959年这80年间,关于“文化”方面的心理学研究论文还不到10篇,而从2000年至2002年仅两年的时间,以文化研究为主题的心理学论文却激增到了8000余篇(彭凯平, 2004)。就国内的情况而言,通过CNKI检索发现,在2004年之前,文化心理学方面的论文共有54篇,平均每年只有一、两篇;而从2004年至2018年,则累计达到了260篇之多,仅2010年一年就有35篇。可见,“文化”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心理学研究中的热点议题。

借用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关于西方心理学发展史的一句名言:“心理学有着漫长的过去,却只有短暂的历史”(引自黎黑, 2013)。同样,心理学对文化及文化差异的关注和兴趣也有着“漫长的过去”,但却直到20世纪后期“文化”才真正进入主流心理学的视野,并成为主流心理学研究中的“关键词”(Key term)之一(Triandis, 2007)。尽管此前心理学家为了回应来自人类学的质疑和挑战,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跨文化研究,但

在那时,“文化”只不过被看作是静态的“背景”,而未被当作处于中心位置的“对象”“内容”或“焦点”。心理学从“科学”向“文化”、从“结构”向“意义”的转变进程(或者也可以说是心理学内部分化的过程),基本上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三波全球化”(也称作“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发生的时间相吻合,这同时也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的时期。第三波全球化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纳入了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人口、资本、商品、信息、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碰撞、乃至冲突变得越来越频繁,对全球和区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樊勇明, 2004)。同时,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也在迅速而猛烈地改变和形塑着世界各地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形貌,冲击和消解着数千年以来人类社会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价值体系和意义世界。心理学需要对这一史无前例的人类社会变迁和影响人类命运的各种新生事物做出反应,需要对自身的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和变革。这就要求心理学家走出实验室,到鲜活、真实和变动的现实世界中去理解人类心理与行为背后的意义,而不能只在实验室和大脑中像生物学家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切片那样去寻找关于人和人类的各种秘密。这

* 通讯作者:李鹏程, E-mail: greatman-28@163.com。

种观念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成为越来越多心理学家的共识。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和教育改革家布鲁纳(Jerome S. Bruner),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之一(宋文里,2010)。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布鲁纳作为两次“认知革命”的主要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受到了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和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Lev Vygotsky)的深刻影响(Harré,1992)。前者使布鲁纳将“认知”和“结构”带入了心理学,后者则使其认识到了“历史”和“文化”在理解人类心理本质中的重要意义,并试图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联结起来,建立一种普适性的文化心理学(Mattingly et al.,2008)。但是,被很多心理学家所忽视的一个客观事实是,在布鲁纳文化心理学思想形成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来自人类学的巨大影响。比如,在布鲁纳文化心理学中所倡导的“叙事研究”(narrative / storytelling)和将“意义”作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心(meaning - centered),与美国解释人类学大师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说的“浓描”(thick description)、以及将文化视为“共享的意义系统”(the system of shared meaning)和“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webs of significance)(克利福德·格尔茨,1999)有异曲同工之处。格尔茨在评价布鲁纳的学术贡献时曾说,布鲁纳不仅“涉猎过心理学中差不多每种思想方法,并改造了其中不少”,而且还不辞辛劳地“把人类学这个庞大而丑怪的骆驼牵进了心理学的帐篷里”,他是当代心理学家中最了解人类学的人(引自巴战龙,2017)。此外,在布鲁纳的个人学术实践中,他本人也置身于人类学的“田野”(field)之中,在实践中而不是实验室里探寻文化对人类心智的影响(Lutkehaus,2008)。因此,通过考察布鲁纳与人类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是理解布鲁纳文化心理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同时,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当代心理学试图通过“文化的触角”来弥合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之间裂隙的跨学科研究趋势(霍嘉西,赵蒙,霍涌泉,2019)。

2 “被遗忘的人类学家”:布鲁纳与人类学的关联

2.1 初识人类学

布鲁纳作为一名初学者进入心理学时,正值行为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动物感知觉、记忆与学习是当时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们

认为,由于人与动物在生物体质上的某些相似性,因此可以通过对动物的实验研究来揭示人类心理的特征与规律。因此,人们很难把心理学与生理学严格地区分开来。换句话说,当时的主流心理学更像是“动物生理学”或“动物心理学”,而不是“人类心理学”。1933 年,布鲁纳进入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学系就读本科的时候,他的很多老师对这种动物还原主义的观点非常反感,这无疑对布鲁纳有一定的影响。正如布鲁纳在其自传中所说:“我的心理学英雄和导师们都是反主流的。……在我还是一名本科生的时候,我最钟情的是:格式塔心理学、弗洛伊德和文化人类学家……他们讨论经验本身的社会起源,认为我们所认知和体验到的内容及其意义来自文化环境、语言符号和神话故事,而不是物理世界和生理刺激。”(Bruner,1983)很显然,布鲁纳从一开始就更倾向于从社会和文化而非纯粹生理的角度来理解人类心理。而且,在与人类学接触的过程中,布鲁纳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了主流心理学忽视文化差异的局限和不足。

与布鲁纳同住一个宿舍的布鲁姆(Leonard Broom)是一名人类学专业的本科生。因此,他通过布鲁姆了解到了一些有关人类学的知识,阅读了功能主义人类学大师、同是波兰裔犹太人的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作品,以及对“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Franz Boas)提出的“文化相对论”也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在 1937 年夏天的时候,布鲁纳还到访了舍友布鲁姆的“田野”——他当时正在研究切罗基印第安人(Cherokee Indians)与其白人邻居接触之后导致的舞蹈文化变迁问题(李筱雨,2016)。尽管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在不同的“地方”做研究,但布鲁纳认为,它们两者之间的差别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人类学家所做的和我所做的并没有什么冲突……我们心理学家(当时我 21 岁)知道,不论人类学家发现了什么,都可以用我们心理学的研究来进行基本相同的解释。但是,我们心理学家却从未关注过‘文化的自主性’(autonomy of cultural form)问题”(Bruner,1983)。这一方面反映出心理学与人类学这两门“姊妹学科”之间关系的密切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心理学对文化因素的长期忽视。

总之,在布鲁纳学术生涯的开始,他就对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其它学科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和热情。通过对人类学著作和田野研究的了解,反观自照,认识

到了主流心理学的不足,也加深了对心理学和人类学之间关系的理解,为后来布鲁纳创立“文化心理学”——在心理学与人类学之间架起沟通和联结的桥梁,提供了感性的经验。不过,在布鲁纳早期的学术研究中,他似乎并没有把基于实验室研究的心智现象(mind)和人类学的文化观念联系起来,甚至关于“心智”或“认知”的研究都非常少。他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1938~1941)和麦克洛奇(McCulloch, T. L)合作完成的第一篇论文是《电击对小白鼠随后学习的影响》(刘洋,2018)。这是一篇符合当时学术主流的动物学习实验研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特别是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向国内进行全面战争动员,布鲁纳因而转向社会心理学研究。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德国纳粹集团的宣传与动员策略问题,而且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舆论宣传的文章:比如,《宣传的范围:对美国人的德语短频广播》(1941),《公共舆论与美国的外交政策》(1944),《公众的舆论与和平》(1944),《公众的舆论与世界秩序》(1945)等(张爱卿,2000)。由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布鲁纳把心理学在国家动员与战争服务中的应用放在了首位,而对文化的兴趣似乎并未成为他主要的关注点。

2.2 与人类学的密切接触

1945年战争结束以后,布鲁纳重新回到了哈佛大学,并在那里工作了20多年,直到1972年离开美国前往英国牛津大学任职。这段时间占布鲁纳人生的四分之一,对布鲁纳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布鲁纳与人类学之间的密切互动,以及人类学对布鲁纳学术发展的影响,也主要集中在这段时期。当布鲁纳再次回到哈佛大学的时候,行为主义已经开始从美国心理学的舞台中心慢慢退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学,因战时的“国民性格研究”而在美国社会和学术界受到空前欢迎;结构主义思潮正在欧洲和美国学术界中渐渐兴起。此时,布鲁纳面临着一次学术方向的重要选择。最终,布鲁纳选择了结构主义学说,而远离了精神分析和人格研究。

1946年,哈佛大学心理学系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联合创建了“社会关系学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成员主要包括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和人类学家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怀亭(John Whiting)等,具有

心理学倾向的“文化与人格学派”人类学家,如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米德(Margaret Mead)、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和林顿(Ralph Linton)等,与社会关系学系也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另一部分心理学家则继续留在原来的心理学系(Lutkehaus, 2008)。布鲁纳虽然与原来的心理学系还保持着联系,并在那里继续讲授一些心理学的课程,但直到1960年他和米勒(George Miller)共同创建哈佛大学认知研究中心之前,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社会关系学系度过的。这个新建的院系为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布鲁纳通过这个平台与来自欧美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等有了更多的接触与交流,对他后来的学术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有意义的行为》(Acts of Meaning)一书中,布鲁纳说到:“这个系(指社会关系学系)每个月都会举行一次‘席明纳’(seminar,即小型学术研讨会),我们在一起讨论作为个体的人是如何看待他的文化性与生物性的。我们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后来形成了本书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其实认知革命最开始的设想是,希望能把心理学与人类学、语言学、哲学和历史学、甚至法学等联合起来。这不是偶然的,也一点儿都不用奇怪,在我和米勒主导成立的哈佛大学认知研究中心中就包括:哲学家奎因(W. V. Quine)、历史学家休斯(H. Stuart Hughes)、语言学家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以及许多人类学家。”(Bruner, 1990)

在布鲁纳所遇到的人类学家中,克虏伯(A. L. Kroeber)和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都劝告他远离“文化与人格研究”。这是二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显学”,吸引了无数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投身于“国民性格”的研究。克虏伯是博厄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个学生,但他却更倾向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观点,即“社会/文化”不是生物个体(有机体)简单相加的总和,而是“超有机体的”(superorganic),因此不能采用个体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与文化现象(李鹏程,罗媛,2018)。这与格式塔心理学所说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完全相同。而列维-施特劳斯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雅各布森的影响,主张文化像语言一样也有其自身固有的逻辑、规则和结构,对布鲁纳认知心理学中有关文化与思维的结构研究、以及结构主义课程理论的提出和后来文化心理

学中有关象征、符号和意义的思考,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Bradd,1997)。可以说,列维-施特劳斯及其结构主义人类学理论对布鲁纳的影响并不亚于皮亚杰。这一点很少被研究布鲁纳学术思想的心理学家提及。布鲁纳对他们两位曾有过这样的评价:“皮亚杰对于我们理解儿童的心理发展,事实上,也包括普通成年人的心理,做出了巨大贡献。我认为他所做的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对于我们理解人类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具有很多相同之处——坚持探寻它们的结构(structures)、关联性(connectedness)、深层规则(deep rules)以及衍生结构(derivative structures)。”(Bruner,1983)

2.3 布鲁纳的人类学实践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布鲁纳与人类学的关联更多是通过阅读、观察、讨论和思考等间接的方式进行的;而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他通过MACOS(Man: A Course of Study,人类研究课程)、“开端计划”(Head Start)和儿童认知发展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或与人类学家紧密合作开展田野研究,或以人类学的方式置身于“田野”之中开展教育与心理研究。布鲁纳的人类学实践,使他成为极少数把心理学实验研究与人类学田野调查结合起来的心理学家。或者说,布鲁纳是一个被“遗忘”了的“教育人类学家”和“心理(认知)人类学家”。

1960年至1961年,美国总统科学与技术问题特别顾问、美国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PSSC)主席、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扎卡赖亚斯(Jerrold Zacharias)计划开展三项教育研究项目:第一个项目是,如何在非洲的学校中开展适合当地学生的科学教育课程(布鲁纳是扎卡赖亚斯负责的非洲教育项目中唯一的一位心理学家);第二个项目是开发新的美国大学物理课程;第三个项目是,面向美国初等教育开发一套通识教育课程,即后来的MACOS课程。在第一个项目(非洲教育项目)中,布鲁纳与他的学生格林菲尔德(Patricia Greenfield)到西非的塞内加尔进行了田野调查,对上过学和没有上过学的沃洛夫族(Wolof)儿童进行了比较研究;结合他的另外一名学生赖希(Lee Reich)在阿拉斯加对爱斯基摩(Eskimos)儿童的研究,1966年布鲁纳和他的学生共同出版了《认知发展研究》(*Studies in Cognitive Growth*)一书。通过对西方儿童(美国白人儿童)与非洲沃洛夫儿童、爱斯基摩儿童的认知发展阶段进行比较,布鲁纳发现皮亚杰关于儿童思维发展阶段的理论并

不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儿童的心理发展受他所在社会文化影响而表现出文化差异,语言、符号和文化在儿童学习、认知发展与意义建构(meaning making)中具有重要作用。这项研究是实验研究与田野调查、认知与文化,或者说是心理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典范,是一项心理学家开展的认知人类学研究(当然,也可以称作是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人类学家马丁利(Cheryl Mattingly)称这项研究使“人类学和心理学以新的方式又重新联结了起来,并开启了一个后来我们称之为‘文化心理学’的新领域。”(Mattingly et al.,2008)同一时期,美国心理学家科尔(Michael Cole)在非洲利比里亚进行的一项关于科佩尔(Kpelle)儿童数学概念学习的跨文化研究,得出的结论与布鲁纳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Cole,1971)。他们两人都深受维果斯基历史-文化心理学派的影响,重视语言、历史、文化和实践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而且都是20世纪后期文化心理学主要的推动者和领导者。

在扎卡赖亚斯的第三个教育项目中,布鲁纳是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但具体项目的设计者是美国人类学家奥利弗(Douglas Oliver)。冷战时期,为了在与苏联的全面竞赛中,特别是在科技竞赛中领先苏联,美国加大了对学校中科学教育的支持力度,由扎卡赖亚斯牵头成立了“教育服务咨询组织”(ESI)这个非盈利机构,进行相关的教育研究和制定课程实施方案,并提供教学建议和咨询。最开始,课程改革主要针对美国高中的物理教学,但在实践中布鲁纳发现,如果没有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作为基础,学生很难真正理解那些抽象、枯燥的自然科学知识,因而也就不会对自然科学感兴趣和主动去学习。所以,ESI又针对初等教育制定了通识教育课程,主要以人类进化史(包括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人类社会组织和文化多样性为课程核心内容(Bruner,1966)。这就是美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一项非常独特的课程改革项目——MACOS课程项目。MACOS所涉及的内容几乎完全属于人类学的范围,由人类学家设计,文字、图片和视频素材来自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其中也有布鲁纳及其学生在非洲和阿拉斯加的田野资料),但在具体教学方面采用的是布鲁纳认知学习和结构主义教育理论。布鲁纳不仅负责组织管理和协调该项目的设计与实施,而且还主动申请到小学五、六年级去教学,以通过参与式观察、与学生的互动来了解课程的实施情况。布鲁纳

说:“我们需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类学家,参与到课程的实施中去,在课堂中去观察,并了解学生的看法”(引自 Lutkehaus, 2008)。布鲁纳的做法完全是人类学的传统和模式:学校、教室和课堂就是“田野”;布鲁纳作为研究者亲自参与到教学中去,并在教学中进行观察、描述,形成“客位”(etic)的看法;通过对学生和其它老师(所谓“报道人”, informants)的访谈和互动获得“主位”(emic)的信息;撰写田野笔记、调查报告和(课堂/教育)民族志(ethnography)。布鲁纳难道不是一个真正的人类学家吗?

3 建基在“文化的解释”之上:布鲁纳文化心理学的人类学谱系

3.1 布鲁纳文化心理学的类型学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心理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文化的热潮,各种自称为或被称为“文化心理学”的心理学理论和心理学分支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破土而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如“文化心理学”(Cultural Psychology)、“社会文化心理学”(Sociocultural Psychology)、“文化历史心理学”(Cultural - historical Psychology)、“民族心理学”(Ethnopsychology)、叙事心理学(Narrative Psychology)和本土心理学(Indigenous Psychology),等等(Markus & Maryam, 2007)。尽管这些“文化心理学”因共同的学术立场——对主流心理学中长久以来盛行的极端唯物主义、科学实证主义、简化还原主义和忽视人类心理整体性、能动性、实践性的不满,而被笼统地归为同一个阵营,但它们在学术谱系、理论传承和关注角度上却有很大的不同。

这些名称各异的“文化心理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持“文化相对论”的立场,将人类心理放置在时间(历史)和空间(地方)的框架下进行历时与共时的考察,视心理现象为社会文化现象的一部分,主张采用话语与文本分析的解释学方法进行研究,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其学术谱系和理论来源主要以人类学、社会学和符号学为主;第二类持“文化普同论”的观点,将心理现象从社会文化体系中剥离出来,视“心理”为“变量”、“文化”为“背景”、“社会”为“结构”,较少考虑社会、文化和心理的整体、历时、协同变化问题,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个体主义、认知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共时性研究,其学术谱系和理论来源主要以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主,认知人类学和跨文化心理学多属于此类;第三类处于两者之间,可以看作是对前

两种“文化心理学”在某种程度上的折中和调和,或者说,是人类学范式的文化心理学与心理学范式的跨文化心理学的联结与融合。

布鲁纳的文化心理学,总体上来说属于第三类,但稍微偏向第一类一些。正如科尔(Michael Cole)所指出的:“杰罗姆·布鲁纳所勾勒的文化心理学,同样强调了人类的经验和行动是由我们的心理意向(intentional states)所左右这一前提。他将心理过程的出现和机能的展现,解释为是在以社会符号为中介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我不想掩盖这些观点中的不同。比如布鲁纳和史威德(R. A. Shweder)非常重视人文学科中的解释和分析方法的中心地位,但普赖斯-威廉姆斯(Price - Williams)和德国行动理论家并没有如此关注。他们在文化心理学的特殊历史根源和提供核心经验基础的数据种类上的观点也有所不同。比如,史威德将文化心理学视为心理人类学家的问题,而布鲁纳则将其视为发展心理学家的课题。史威德大量地汲取了西欧和美国的的社会文化理论,很少提及德国人和俄国人的成果,而布鲁纳最初的理论架构就是由维果斯基提出的。”(Cole, 1996)

科尔在博士后期间曾师从维果斯基学派的鲁利亚(Alexander Luria),对俄国“历史—文化理论”及其传播非常熟悉,他对布鲁纳文化心理学的评价应当说是比较准确和中肯的。但是,作为心理学家,科尔可能太过于强调了布鲁纳文化心理学的心理学谱系,而忽视了上文所说的布鲁纳文化心理学本身所具有的杂糅性和调和性的特点。“杂糅性”与布鲁纳多学科的知识背景以及在哈佛大学的那段学术经历有很大关系;而“调和性”则反映出布鲁纳希望借助于“文化”及与其相关的人类学、语言学、哲学和文学理论等,重新确立“意义”在心理学中的核心地位,以解决自冯特(Wilhelm Wundt)以来心理学内部出现的学科分裂问题。布鲁纳在解释写作《有意义的行为》一书的原因时曾说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心理学——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称之为关于心智的科学——正处于其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分裂时期。它丧失了自己的核心,并且面临失去维系其内在交流所必须的凝聚力的危险……‘生物学’层面的心理学摒弃了自己的古老基础而加入了神经科学,新兴的‘认知科学’则吸收了过去属于感知、记忆、思维等领域的很多东西,而现在这些领域被认为是‘信息处理’的分支。……

本书以当今的心理学为背景,并考虑到它混乱、脱离现实生活和新的还原主义问题,我将其称之为《有意义的行为》是为了强调它的主题:即意义构成的本质和文化结构,及其在人类行为中所处的核心位置。”(Bruner,1990)因此,布鲁纳与那些较为激进的文化心理学家或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家有所不同,他没有全盘否定神经科学、信息加工心理学等“科学心理学”的贡献,也并不想在心理学中另辟蹊径、创立一门崭新的分支学科。正如他一再申明的那样,“认知”和“认知革命”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而是由于人们对“确定性”的过度渴求以及科学技术的异化使它们偏离了最初预设的发展轨道。在布鲁纳看来,心理学应该回到它最初开始的地方,重拾它关于人类和人性的学科属性——既不是“刺激—反应”的动物行为主义心理学,也不是“输入—输出”的机器行为主义心理学,而是一门真正的关于“人类心灵”的学科。

3.2 布鲁纳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及其人类学谱系

“文化”(culture)是文化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中最重要的一個概念,是理解布鲁纳文化心理学思想的关键,也是一切被称之为“文化心理学”的理论学说的概念基础。因此,搞清楚布鲁纳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是什么意思,或者说,布鲁纳是怎么理解和解释“文化”的,对于准确理解和把握他的文化心理学思想非常重要。同时,众所周知,在心理学传统中,心理学家主要研究“心理”或者“身心关系”问题,而不研究“文化”;“文化”一直都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可以说整个人类学的学科大厦都是建基在对“文化”的解释之上的。所以,无论是布鲁纳的文化心理学,还是其他心理学家提出的文化心理学,肯定是从人类学、而不是从心理学中汲取了学术灵感和理论养分的。因此,还有必要弄明白人类学中哪些理论观点对布鲁纳的文化心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即布鲁纳文化心理学的“人类学谱系”。

在布鲁纳的著作《有意义的行为》中,他对“文化”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认为,“文化”不是一种物质或精神实体,而是人们对世界的共同建构和塑造的产物,是人们共享的认知结构和知识的集合。具体来说,文化包括“标志、符号、语言、事实和概念等各种符号系统和共享的观念与信仰”(Bruner,1990)。此外,布鲁纳还提出了“文化的双重性”(the double nature of culture)这一概念,即文化既是人们创造和制造的,也是人们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制

约下的产物。他认为,文化是一种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知和理解的产物(Bruner,1990)。这表明布鲁纳的“文化观”是认知主义、符号主义、建构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即把文化看作是一种人们借用符号、通过社会互动建构起来表达特定意义的载体,意义(meaning)既是“文化”的本质,同时也是“文化心理学”的核心。布鲁纳曾明确指出,文化心理学是一种解释性的学科,而不是探究因果关系的实验科学;实验与统计可以观察和量化行为,但无法解释行为背后的意义(Bruner,1995)。

人类学对“文化”的定义和解释对布鲁纳的文化心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符号主义(symbolism)和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符号主义是人类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以符号、象征和意义为中心,认为文化是由符号构成的,人们通过符号来理解和交流意义。符号主义者认为,符号不仅是文化中的基本单位,而且还是人类思维和沟通的基础(Kockelman,2013)。布鲁纳接受了符号主义的观点,他认为人类思维和文化的形成都是基于符号系统的,这些符号系统是由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如数字、音乐、视觉等)构成的。他的文化心理学理论将符号系统视为人类认知和文化活动的核心。文化相对主义是另一个对布鲁纳文化心理学产生影响的人类学理论流派。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文化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不同文化之间不存在绝对的优劣和评价标准,因为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信仰、价值观、想法和行为方式。布鲁纳也接受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并在他的文化心理学理论中有所反映。布鲁纳非常重视文化差异的重要性,认为理解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对于理解人类认知和行为的多样性至关重要。这些理论学派的影响使得布鲁纳将文化视为符号和意义的交流与共享,是人们建构自身身份、社会关系和认知世界的重要方式。因此,布鲁纳认为文化是人类认知和行为的核心,并将文化心理学定义为“文化符号系统和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Bruner,1990)。

4 结语

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心理学与人类学在其早期阶段彼此之间是高度融合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一起共同研究了大量有关文化和心理的基本问题,包括文化对人类行为和心理过程的影响,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

的思维方式和知觉经验等(Kleinman, 1986)。当时很多心理学家有着人类学的教育背景或学术经历,很多人类学家本身就是心理学家或与心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科学心理学”的主要创立者、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在年轻时,就曾拜师于德国人类学家卡尔·冯·里特(Carl von Rokitansky)学习解剖学和人类学(Mischel, 2016),他晚年的巨著《民族心理学》(Völkerpsychologie, 1921)应当说是一套正儿八经的人类学著作;功能主义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获得过心理学硕士学位,并受到威廉·麦克道尔(William McDougall)的指导,后者曾在牛津大学创立了英国的第一个人类学讲座(Kuper, 1996);而被誉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博厄斯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时,曾经参加过冯特主讲的哲学课程,并且与他有过交流,后来也受到了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影响(Stocking, 1992)。然而,20世纪中期以后,由于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学科专门性不断加强,以及因各个学科“建章立制”和划分“势力范围”等,心理学和人类学开始逐渐分道扬镳。它们各自发展出了独立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心理学更注重实验研究和心理过程的内部机制,而人类学更注重人类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描述和解释;心理学变得更加“内向”,而人类学一直保持“外向”,并且两个学科之间的往来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

进入21世纪以来,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变得越来越普遍,心理学和人类学之间的交往与合作也开始逐渐增多。文化心理学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正是这种交往和融合所孕育出的硕果之一。包括布鲁纳在内的众多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在促进心理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再联结”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通过追溯布鲁纳的学术生涯,细寻他与人类学之间的关联,剖析他的文化心理学思想,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 and 继承布鲁纳的学术遗产,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促进心理学与人类学这两个姊妹学科之间更加密切的交往;同时,也希望通过正本清源,使我们重新思考心理学的“初心”:建立一门真正理解和解释“人类心灵”的学科,而不只是“大脑”。

参考文献

巴战龙. (2017). 布鲁纳和“人类:一门研究课程”. *中国民族教育*, (12), 16.

- 樊勇明. (2004). 第三波全球化的经济效应. *国际观察*, (6), 8 - 14.
- 霍嘉西, 赵蒙, 霍涌泉. (2019). 文化心理学与人类学积极融合的新趋势. *心理学探新*, 29(5), 400 - 405.
- 克利福德·格尔茨. (1999). *文化的解释*.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黎黑. (2013). *心理学史: 心理学思想的主要流派* (第6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李鹏程, 罗媛. (2018). 文化心理学的人类学之根——论20世纪美国人类学中的文化心理学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 152 - 159.
- 李筱雨. (2016). *布鲁纳教育思想转型研究——以《心灵探寻》、《赞颂分歧》的解读为中心*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 刘洋. (2018). *那些智慧的心理学*.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彭凯平, 等. (2004). *人格与社会心理学论丛(一)*.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宋文里. (2010). 当代文化心理学的缘起及其教育意义——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布鲁纳《教育的文化》评述. *民族教育研究*, (6), 23 - 29.
- 张爱卿. (2000). *放射智慧之光: 布鲁纳的认知与教育心理学*.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 Ambady, N. (2011). The mind in the world: Culture and the brain. *Assoc. Psychol. Sci.*, (4), 463 - 471.
- Bruner, J. S. (1966). *Toward a theory of instru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uner, J. S. (1983). *In search of mind: Essays i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Bruner, J. S. (1990). *Acts of meaning: Four lectures on mind and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uner, J. S. (1995). *Play - Its Role i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Cole, M., et al. (1971).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learning and think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 Cole, M. (1996). *Cultural psychology: An once and future disciplin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rré, R. (1992). The second cognitive revolu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 181 - 187.
- Kleinman, A. (1986). Anthropology and psychiatry: The role of culture in cross - cultural research on illnes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4), 447 - 454.
- Kockelman, P. (2013).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Second Edition). Oxford: Elsevier.
- Kuper, A. (1996).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sts: The Modern British School* (3rd ed.).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Lutkehaus, N. C. (2008). Putting "Culture" into Cultural Psychology: Anthropology'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uner's Cultural Psychology. *ETHOS*, (1), 46–59.
- Markus, H. R., & Maryam, G. (2007). *Handbook of cultural psychology*. New York &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 Mattingly, C., et al. (2008). Bruner's search for meaning: A conversation between psychology and anthropology. *ETHOS*, (1), 1–28.
- Mischel, W. (2023) *Wilhelm Wundt and William James*.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Winter 2016 Edition). 2023–3–12 取自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16/entries/wilhelm-wundt-William-James/>.
- Shore, B. (1997). Keeping the conversation going: An interview with Jerome Bruner. *ETHOS*, (1), 7–26.
- Stocking, G. W. (1992). *The Ethnographer's Magic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Triandis, H. C. (2007). *Handbook of cultural psychology*. New York &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Reconnecting Psychology and Anthropology

——The Anthropological Experience in Jerome S. Bruner's Cultural Psychology

Li Pengcheng^{1,2}, Luo Yuan¹

(1.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Hexi University, Zhangye 734000;

2.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Jerome S. Bruner,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promoting the reconnection between psychology and anthropology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psychology. Through "first acquaintance Anthropology", "close contact with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y practice of Bruner",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d vividly reveals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Jerome S. Bruner and his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anthropology.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makes a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Bruner's cultural psychology, traces the anthropological pedigree of his "cultural view",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school of symbolism and cultural relativism in anthropology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Bruner's cultural psychology. By showing Bruner's academic experience and the neglected "anthropological experience" in cultural psychology, it not only helps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ultural psychology, but also enables us to better reflect on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creating psychology.

Key words: Jerome S. Bruner; cultural psychology; anthropological experience; history of psychology